

“跨界”书生许子东：责任感让我“说话”写字

本报记者姜锦铭
实习生胡业浩 张锦楠

不同于电视嘉宾、新媒体谈话节目等媒介平台的出境，许子东这次携《现代文学课》进入公众视野才算是他的本色当行。观众犹记得他参与的经典三人组合谈话节目，嬉笑怒骂也洞幽烛微，“将学术融于日常话题中”。作为学者的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以《郁达夫新论》声誉鹊起，彼时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钱谷融先生，现在的他则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希望新著带领读者“快快乐乐地进来，辛辛苦苦地出去”。他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却对当代社会的林林总总投以热切目光并发表看法；他的课堂在香港，但通过直播平台，上百万内地读者能分享到他的研究心得；他下乡当过农民，工厂轧过钢，文学硕士读的是电气自动化，然而他说“骨子里自己还是教书匠”。

■访谈实录

谈文学课：在海内外不同的版本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可能

记者：对比已有的文学史著作，请问您的《现代文学课》独特之处在哪里？

许子东：第一，不是手写的，是说的，是从我口到我手，肯定就比较通俗浅白一点，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平时的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即兴的，所以不是那么严谨。另外，严格说这本书也不是文学史，只不过是一门课，当然这个课也会有文学史的一些思路在。

现代文学史从最早的王瑶(注：文学史家，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再到上个世纪50年代后还有几本，比如刘绶松、张毕来等等，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些文学史都跟主流思想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实文学史写作一直是有变化的，其核心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对主要作家有一定的排序。我在香港教这个课，除了用北京的教材，同时也用一些海外的教材，包括香港的、日本的，其中主要是美国夏志清编的文学史。他就是“发现”了几个作家，比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所以我的书第二个特点是，在现有的文学史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比如把“鲁郭茅巴老曹”和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放在一起讲，看中间是不是也可以找到共同或连贯的地方。

记者：现代文学史的作品就在那里，但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以及在不同的地方对它们的评价都不一样，您觉得是否存在一个恒定的评价标准，我们现在对它的评价以后还会不会变？

许子东：将来还会再变，很难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这是一个现实，但也不代表文学史本身没有自己的规律或标准。就好像讲历史一样，不同的人来讲，就有不同的历史，永远是这样，但这不代表历史就是“让人随便打扮的小女孩”。

问题是两面的：一方面要看到，文学也好，历史也好，文学史也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来写，根据不同需要，的确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我不同意历史是虚无的，怎么写都可以。所以，我想尽我个人的力量，去寻找不同的写法中我心目中的文学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解释不同时期不同人写的文学史，他们的依据在哪里。我不仅讲五四文学的精神和作品，而且也回顾过去一百年对于五四文学各种各样的曲解也好，发展也好，整个过程我们必须看到。

谈文学史：还有多少年轻人会花时间去读郭沫若、老舍、曹禺？可惜了

记者：就像夏志清重新评价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一样，您觉得随着各种资料不断被发现，现代文学史会不会再出现被大家所忽略的某个现象或者作家？

许子东：有很多人，特别是海外，他们挖掘出各种各样的资料。比如王德威(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近年编了一本新的现代文学史，英文已经出版了，中译本也将出版。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他找了140多位海外的汉学家，每个人写2000字。从17世纪明代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文革”以后，把每样相关的事都写进去，尽量去找边缘的文学史现象。比如讲林语堂，不是讲林语堂的创作，而是关注林语堂到了美国发明了一种打字机。再比如，最早的现代小说是什么，哈佛的韩南教授就发现，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举办过一次征文比赛，要求写中国的三样东西：小脚、鸦片、科举。最后有几十个人去投稿，但那个美国人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事就回加州了，那几十篇文章就没有发表，过去了许多年这些文章就发现了，就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小说，比其他后来的作品早，这是发生在19世纪的事情。这种资料的开拓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包括国内。我每年参加“唐毅青年文学研究奖”，看到的论文，现代跟当代差别很大，当代的文学研究有很多思想以及理论上的突破，有各种各样新的争论。而现代文学研究更多的转向资料考证，就像做古典文学研究一样，比如鲁迅的一篇《阿Q》，把各种各样古代的文章找出来。现代文学研究在观点上目前似乎没有大的突破，就是这么二三十年，你要再发掘出一个大家原来不知道的作家，就像前些年说穆旦非常好，钱钟书怎样怎样，可能很难。

就我而言，对于“鲁郭茅巴老曹”这个主流秩序还是维护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跟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并不是矛盾的，这中间是有共同点的。我深深感到焦虑的是，因为比较僵化的文学史写，目前90后00后的一些年轻人，对于主流叙述感到不太耐烦。还有多少年轻人会花时间去读郭沫若、老舍、曹禺？很少。我觉得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可惜了。所以我不仅喜欢张爱玲、沈从文，并认为尤其要珍惜鲁迅的财产。现在青年人觉得“鲁郭茅巴老曹”就是老一套的东西，其实不对，上个世纪50年代，王瑶的文学史写出来以后也是被批判的，当时新的文学史如张毕来、刘绶松、丁易的，把所有作家分成三类：第一类叫革命作家；第二类叫进步作家；第三类叫反动作家。沈从文这种叫反动作家，巴金这种叫进步作家，所以曾经有一度并不是“鲁郭茅巴老曹”，“鲁郭茅”之后应该排丁玲、赵树理、蒋光慈，或者“左联”的作家。等到唐毅和钱理群他们的现代文学史出来，已经反映了中国几十年主流思想的变化，我的文学课尽量想让读者知道这个过程。

谈作家：张爱玲对礼教的批判和鲁迅一脉相承

记者：您刚刚谈到“鲁郭茅巴老曹”与沈从文、张爱玲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能否再深入解释一下。

许子东：沈从文很多作品是对农村的描写，有人认为是他在唱田园牧歌，美化阶级矛盾等等，其实沈从文的作品也有很多对社会的批判，比如《萧萧》，女主角为什么最后没有被“沉潭”，那是因为她生的是儿子，如果生的是女儿就惨了。故事某种意义上



▲许子东（新华社资料片）

很悲惨，和祥林嫂不同的悲惨，受害的女主人公最后又去害别人，相当于一代一代延续。

张爱玲的《金锁记》基本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延续，她对礼教的批判是和鲁迅一脉相承的，今天很多人说张爱玲是完全不同的作家，不对！举个例子，张爱玲后来到美国把《金锁记》写成英文，想在美国出版。她很羡慕林语堂，也要靠写作吃饭，结果编辑不给出版，因为他们认为你把旧中国社会写得这么黑暗，不就是等于说共产党好吗？张爱玲就把这封信给了夏志清看，意思就是说你叫我怎么办，我看到的中国就是这样。你难道要我说拙鸦片裹小脚的中国惨绝吗？张爱玲从骨子里也是坚持这种类似鲁迅的精神，直面惨淡的人生。这些作家的相通之处被偏见给漠视了，所以我会想办法把它找出来。

另一方面，有一些公认觉得好的作品，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思想，但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这本书看上去是一个浅显容易进入的教材，其实，现代文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学术争点也都涉及。王德威的评论当然是过誉：“最开阔的史观、最精彩的内容、最动人的表述”。最字应删。举个例子，我们今天谈巴金的《家》都说是反封建，但我指出《家》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按年龄画一个表，比鲁迅大的都是坏的，比鲁迅小的就是好的，这是对进化论的一种简单图解，所以年轻人都是好的，年纪大的都是坏的。第二，里面的正面人物二哥哥觉民，在鸣凤跳湖以后用一种称赞的口吻对觉新说，真没想到，鸣凤是这么一个烈性的女子。啥意思？就是说宁折不屈，是称赞她的。鲁迅很早写的一篇文章《我之节烈观》就分析过烈女，有一男人要碰她，就要跳湖保持自身清白，这是礼教里非常“吃人”的部分，但是在《家》里面还是称赞的，所以我就指出巴金非常真实，他不仅写了他真实的反抗，也暴露了他真实的传统价值观。

曹禺的《日出》一样可以排一个表，我上课的时候叫学生们排，按有钱没钱排，结果发现，以主人公陈白露为界限，她有钱的都是坏的，比她穷的都是好的。这种思想框架，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当人们在网络上表示态度时，有些人也喜欢以穷富来论好坏。

谈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是“以史带论”而不是“以论带史”

记者：您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非常独特，比如《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您把研究对象通过列表等手段从各个角度分析，似乎是采用理科思维一样的“切割”方法进行研究。

许子东：这个方法朋友分析过，我以前读工科，他说工科生喜欢把文学当作一种材料，冷静地分析，不加入主观看法。其实我后来也受了结构主义的影响。像那个研究，是受了俄国的一个形式主义者普洛普的影响，他把一百部俄国历史民间的童话全部展开，最后总结出来共有29个功能6种人物，关于这一套模式，他写了一本书。我模仿他的方法，就把50部——最开始是100部——写“文革”的小说所有的情节拆开来，最后发现都有一套共同的模式。

文学研究，人文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叫以论带史，一种叫以史带论。以论带史是说有一个观点，然后去找一些材料去证明；以史带论，就是拿一堆材料在里面研究，然后带出观点。我喜欢第二种方法。今天许多报纸、杂志，包括学术论文都是用第一种方法，注意到什么事情，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有几个特点，每个特点找些例子，然后写成一篇文章。我是要用别人找的案例来做我的分析。两种分析方法的结论也可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后者的分析过程比较科学。

记者：这种“切割”似的分析方法是不是适合内容浅显或者类型化的作品，而对于比较复杂深刻的作品就不太适合了。

许子东：不会，结构主义方法是一种现象分析，不是价值评判，不讲好坏，只是比较它们的共同点和规律性，是一种形式主义的 분석。比如爱情小说有很多，古今中外找出100部爱情小说，如果分析一下，一定还是有些规律的，人物是一男一女，一男多女，或者一女多男等等，结局是悲剧或者喜剧……这些概括得出很多文化、政治、历史上有益的看法，但不能穷尽它们的文化价值。再比如《镜花缘》《金瓶梅》《红楼梦》，它们有相似的地方，但文学上的高低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不是说对于复杂深刻的作家就不能用这种方法，比如刚才谈到的鲁迅、张爱玲的比较，我们也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有意思的看法。

谈赵树理：夏志清也没看懂他

记者：您的文学课里没有提到赵树理，想请教您对他的评价。

许子东：这个文学课只是现代文学史的前半部分，这个课侧重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40年代的作家都没涉及，张爱玲是后来加上的，钱钟书也没讨论。我在香港岭南大学的现代文学课还有另外一个学期，主要讨论萧红、梁实秋、钱钟书、张恨水，当然很重要的就包括赵树理。

早期的赵树理也像很多作家那样，是很文艺腔的，但他发现这些在农村不管用，农民不接受，所以他就改用比较口语的、乡土一点、传统讲故事的写法。其实延安时期，写得最好的作家是丁玲，最符合主流精神，比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得过“斯大林文学奖”。

赵树理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后来很多作家开始写农村合作化，赵树理也写，但他不写主流英雄人物。赵树理有一个最主要观点叫“中间人物论”，当时不是把人分成好人坏人吗，赵树理说他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是不好不坏的人。比如《小二黑结婚》，最主要的不是小二黑、小芹，或者村支书，也不是那两个恶棍，大家记住得是“三仙姑”和“二诸葛”。但赵树理这个“中间人物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被批判了。赵树理像很多好的作家一样，仍坚信自己的东西，坚持自己的创作，这点是很多人没看到的，包括夏志清。夏志清说赵树理文笔不通，跟着指挥写作，我觉得夏志清完全没有看懂赵树理，更没有仔细理解他前后的处境。

萧红去世后，夏志清也意识到他忽略了萧红是不对的。不同形态文学史之间的隔阂，我们应该把它打破。

记者：作为读者，有时会遇到读懂与读不懂的问题，有的是处于不同的价值观层面做有利于自身的解读，文学史上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许子东：这是一个基本方法、态度的问题，其实不存在读懂与读不懂。一般的读者读作品，我主张先不看评论，直接读作品。先读作品，肯定有第一印象，可能觉得很好看，或者很震动，也可能觉得不明白，或者很闷不好看。不管有什么感觉，都不要急于否定，先记下来，然后再去看评论，看文学史，这时就会发生至少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学史和你的感觉差不多，或者文学史比你想的多一点，那是最好的。通常我们就说“读懂了”。第二种情况，你看到的是蓝色的，文学史说它是红色的。你觉得读来很闷，但文学史说它非常精彩。或者倒过来，你觉得很好看，文学史对它的评价不高。就像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小说是福尔摩斯，很喜欢柯南·道尔，但英国文学史评价并不高。当时感觉非常奇怪，这么好的小说，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又好看，又揭露社会黑暗。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简单否定，既不要用文学史别人的看法来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你的看法去否定文学史，还是先记下来，过段时间再看一遍，看两者之间是否有相同之处。若没有找到，就先放在那儿，保留你自己的看法，若干年后总会找到的，这是对文学真实的感受。而且自己也会变化，文学史也会变化……之后的感受又不一样了。所以，懂和不懂不是最重要的。

谈跨界：介入传媒和我的学问形成互相撞击

记者：您对社会时事的关心和文学的授课有什么内在关系。

许子东：这是事后回想的，刚开始并不是有意的，我进入电视节目开始是一个简单的动机，当时觉得在香港教书，拿着大学里相对比较优厚的待遇，总得忧国忧民为国家做点事儿吧，那么我在香港可以为国家做什么事呢？就想到了可以发表一下言论和看法，接地气嘛。时间久了之后发现，传媒和我自己的教学研究的确很有关系，互相促进。当然，即使今天，学校也一直有人质疑，说做节目会影响教学和研究。我认为是有帮助和好处的。很浅显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对口语的表达有了信心，再深的学问，最好先说一遍。今天有人写论文，写得天花乱坠，看看看不懂，或者只有学术圈儿的几个人在绕圈子，一定要把简单的东西写得让人家看不懂为止。我觉得再深的东西，你要能浅显地讲给人家听，这对你的学问是个考验。

鲁迅有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个题目很绕口，但你去读那篇文章，鲁迅把非常复杂的、公元三世纪中国文人的处境、态度、文风，讲得非常浅白清楚，你顺着他的思路去读……我非常佩服。另外，我非常喜欢一些做学问的人，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你看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那么多，像他这样的还很少，正文写得那么通俗，实际上学识(总结里)是那么的深厚，很多做古代研究的著作一上来就让你读不懂，真是差太多了，这就是《万历十五年》为什么能成名著。

我第一次做电视节目以后才明白，不要以为自己学问深就可以讲得别人不懂，人家不懂未见得你就是深刻。再复杂的事情，如果对面坐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大学生，如果他都听不懂的话，你这个学问恐怕就没做好。“三人行”谈论的话题有时候很通俗浅白，有时候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前提是要讲真话，必须说得简单，最好说得好笑，这对我想问题、看问题、表达问题就是一个考验。对我后来上课做研究都有帮助，我后来做节目“重读鲁迅”，“细读张爱玲”也是，都从口语出发，先做音频，从讲出发再变成文字的字句。

做节目差不多20年，不是生不逢时，而是正逢其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各种文化课题层出不穷，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赶都赶不上的课题，每天你只要在网上看，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新的问题。我的武器很简单，还是鲁迅和五四文学，或者背后还有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启蒙主义等等一些理论观点，但问题是全新的。

当我参与这样的节目时，常常同时在两面检验：一方面，发现鲁迅100年前就说过的话今天一点不过时，最近我还把他的一段话(形容某些人争论的逻辑)引出来：“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谎也。卖国贼是说谎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鲁迅的文章就是这么写的，我看呆掉了。你以为100年天翻地覆，其实网上很多新瓶旧酒。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有话说，原来鲁迅、马克思、卢梭等伟大人物之前说的话完全可以解释今天的事情。

另一方面，今天也有的是事情是他们解释不了的，全新的现象，比如为什么一百年以后人变得有钱了，科学发达了，有手机了，人为什么还和阿Q一样呢。这是鲁迅他们没想到的，鲁迅认为孩子们的新世界是很美好的。所以我这个节目让我客观上对中国的国情更多了解，而中国的国情代表着世界上变化最快、变化最大国家的文化。这些与原来我做的学问形成撞击、挑战，当然也促进了我的研究。

从这两点意义上看，介入传媒是有好处的，我一度是犹豫的，甚至有点后悔，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有时节目的话题也不由我来主导，有时候也无聊，讲100句，有80句是废话。但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不后悔介入这个节目，还包括《见字如面》《圆桌派》这样的节目。这样的节目对舆论环境也是有好处的，最簡單的好处是，如果把这些言论搜集起来，也就了解了过去20年老百姓在饭桌上说的一些话。

谈读书：推荐《马丁·伊登》西方美学史》

记者：请您推荐几本影响自己经历的书。

许子东：有两本，以前说过：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农村下乡，当时感觉前途渺茫，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那时候也读很多不同的小说，这本对我的影响最大。有趣的是，今年我担任北京一个文学奖的评委，其中有一个环节，电视台有个分开的、背靠背的采访，让我们5个人(还有高晓松、金宇澄、阎连科、唐浩)说一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这么五个人，每个人讲一本书，重合的几率有多少呢，应该很小，如果重合的是《红楼梦》或者鲁迅的著作，几率还大一点，结果我和金宇澄说的是同样一个作家，我讲的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他讲的是杰·克伦伦敦传》，就是别人写杰克伦敦的一本书，事后，我们五个人出来一对，我跟金宇澄就呆掉了，我说天下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杰克·伦敦不是一个特别红特别大的作家，虽然他是美国在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作家，列宁也很喜欢，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他在美国排几十名都排不上，居然我们两个都喜欢这个作家。

另外，研究方面，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一本书是朱光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一页检查一面写出来的《西方美学史》。

黄俊

刚到办公室，单位收发员就送来了父亲的信。拆开信封，满满好几页信笺中除了简单问候之外，字里行间最扎心的是对生活和工作

的鞭策和勉励。

父亲给我写信由来已久，至今想起记忆犹新，那些陈年家书唤起我久远的回忆，激动而又温馨。

想当年，刚满10岁的我考上了离家十几里地的一所寄宿制初中，学校规定一周五天半时间只能回家一趟。头一回离家那么远，再加上年纪小胆子小特别想家，我经常跑到学校围墙朝着家乡的方向偷偷流泪。在异地工作的父亲得知情况后，立马托人捎话要我坚强独立；并且还给我写了一封信鼓舞我独立自强、洁身自爱。尽管信件在一个月后才到，但信中饱满的纸浆之情宛如黎明晨曦，将希望的光华照进我晦暗仄仄的心灵空间，点亮心灯，慰藉了我的寂寞，使我逐渐从孤独胆小和懦弱中走了出来。

初二下学期，父亲从国企调任乡镇纪委书记。基层工作极其琐碎繁忙，可父亲这位军人出身的纪检干部劲头不减，依然乐于写信来激发我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活也不多，但写信起来都是洋洋洒洒好几页纸，始终洋溢着对我的谆谆教诲与悉心关怀。他在信中要求我念好书，为弟弟妹妹树立一个好榜样，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完成学业；并且还结合古今来名人励志成才的故事教我完善自身，在我心灵的土壤里种下明是非、懂廉耻和识大体的金种子。

高中期间，学校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县城。高二下学期，我由于贪玩导致学习成绩连续下降，父亲并未因此对我拳脚相加，但在写给我的信中言辞恳切地用一个典型案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启发我，慢慢地将那偏离航向的我引向正道。他说，人生就好比是一张洁白的白纸，千万不要在纸面上染上任何污点，否则再好的“橡皮擦”也难以将其擦拭干净。在这身心全面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仅要刻苦钻研学好本领，还要永葆纯良的本性，不但不能玩物丧志，还要具有急公尚义的美好德行，做到不忘人恩、不议人非、不评人短。“可怜天下父母心”，后来，我到了离家好几百里的地方念大学，踏上了一段陌生而又新奇

的青春征程。这年，父亲调任本地县直机关，工作岗位换了，责任更大了，但是写信的热情也未减。他在信中鼓励我读书是最容易走的道路，但人生苦短必须找准目标认真走好每一步，凡事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那些年，父亲的指点和影响滋润了我的文笔，让我对文学有了一份由衷的热爱，在博览群书刻苦练笔的过程中，慢慢地把自己的文章变成了报刊上的铅字。

时光回溯，23年前我大学毕业

后到了千里之外的福建滨海一所学校任教。从教期间，父亲利用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界前辈的经典事迹，引领和激励我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师表，在教学业务上小有建树。工作之余，谨记父亲在信中的叮嘱坚持笔耕不辍，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文章，出版了以自己写作作品集(楚音的回响)、纪实体小说(威略将军传)等，成为了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对福建工作的十年间，得益于父亲的热情和濡染下，书写出别样的人生，得益于诸多文章见诸报端，我受到了本地宣传系统主要领导的青睐，从一所普通中学进入市委宣传部工作，开始了一段全新的职业旅程。

记得蒙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在其有生之年，能根据自己的走过的路来启发教育子女。”其实，父亲书念得不多，但他聪慧好学且富有恒心力，部队三年习得一手好字。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在部队和工作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好作风，结合家庭情况演绎成教育子女的“传家宝”，并通过书信将这些精神高地的宝贵财富源源不断传输给家人。可以说，父亲的书信是联络家人感情的载体，承载着他对下一代的严管与厚爱，一封封家书挟裹着宝贵家风久远流长。

父亲是个执着而不严谨的人，即是在这个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也坚持把手写的书信一次次寄到我的手中。几年前，我调入福州市某区机关工作，父亲信中的主角则换成了包青天、海瑞、焦裕禄、孔繁森等古今廉政楷模，目的在于引导和教育我能时刻保持廉洁，克己奉公，不忘职业操守，随时把心屋浮尘杂念彻底清理干净。

梦里时光一晃是一年，游子心底驻春秋，抵不住光阴似箭，宝贵时光于指尖悄然溜走，屈指细数竟有20余载。由于工作的地方靠水面临江海，每当我面对潮起潮落听涛涛声，心中百感交集：现实生活中，父亲事无巨细的爱、俯身成山、仰立成山，源源不断的来信如同助推器，推动我生命的半径由原来的几里地一点点拓展到了千里之外！

现在，我有幸进入了纪检监察系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纪检二代”。此时，父亲已退休多年。可他写信的劲头反而比以前更充足了。我国从古至今无数清官廉吏，都成了父亲笔端的首选。他这样写道：“打铁必须自身硬”，纪检监察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纪检监察工作艰苦繁杂，宣教工作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话，你务必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赤胆忠心，讲党性重品行，耐得住清苦和寂寞，勤于修炼和提升自己，以足够的底气和正气忠诚履责，不要做出违法乱纪的劣来。”有了父亲的谆谆教诲，“吾日三省吾身”，向好思想“防腐墙”，织牢生活“护廉网”，常敲人生“警钟”，使自己永葆人民公仆本色，做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纪检人，让我始终不忘初心，迎来属于自己的一方秋色。

满纸无限情，笔下有乾坤。记得去年回家过年的那几天，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有时候会摩挲着已有些发黄的信件若有所思。我从话中听出了眼泪和深情：其实父亲是睹物思人，是在念和牵挂我这个长年客居他乡的长子。盛唐诗人张籍的名作《秋思》“洛阳城

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所蕴藏

捉错园

秦殿杰 (583)
“出危险后果自付”，“自付”之“付”是错字；造成事故已负责，正写是“后果自负”。

*自负：自己负责，如“文责自负”不是“付出”的“付”。

欲作家书意万重

(待续)